

1978年秋天,我在本该大学毕业的年龄,跨进大学的校门。

我是坐在一辆三轮蓬蓬车上去报到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方方正正地放在左胸贴身的口袋里,还有二十块人民币。全部行李是一个网兜和一个纸盒箱,网兜中放着脸盆、搪瓷缸、毛巾、牙膏、牙刷,纸盒里有换洗衣服等,最重要的是有一件藏青色的涤卡中山装、一条咔叽布裤和一双猪面皮鞋。这套行头曾调动了我对新时期男大学生外在形象的全部想象,其实,它的模板还是深刻地根源于我生活了二十年的皖南小城的某位男子,他是剧团的男主角。



许若齐, 安徽省历史文化中心研究员, 安徽省黄山文化书院副院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文集《夕阳山外山》《烟火徽州》等近十部。



18年前的夏天,我从东至县城汽车站坐上大巴车,目的地是安徽大学。

我是一个严重偏科的学生。高考前,班主任曾笑着对我说:“你的数学要是考及格了,我们就去数学老师家门口放鞭炮。”那时候,没有条件上补习班,也没有网络去学习大神们的解题思路,只能靠日复一日地刷题。最终,我的数学超常发挥,总分压线考上了安徽大学,只不过要接受专业调剂,从我最喜欢的对外汉语调到了



汪贵贵, 青年作家, 出版有《普通人的10w+生活》等图书。

丽娃河畔的时光

许若齐

我们班级年龄最大的35岁,是四川的一位姓卢的女同学,后来被我们尊称为“卢兄”,最小的应届生才17岁,我充其量算个小老弟。同宿舍的老付,鲁西北农村的生产队长,两个孩子的父亲,下午在地里收拾完最后一茬庄稼,晚上就匆匆乘夜车奔赴大上海。睡觉时,看着他穿着大花裤衩在高低铺爬上爬下,大家便不断编排出许多笑话调侃他。老龙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屯垦戍边,问起他那里可是梁晓声所言的“一片神奇的土地”,他总是摆摆手,“八年了,别提它了”,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应届高中毕业的小沈刚开始还有些调皮,我们把他提溜到“卢兄”面前,让阿姨开导开导,“卢兄”笑而不语,小沈嘤嘤,从此屁颠屁颠地跟在我们后面玩。

那是一个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年代,我们每天读报,看电视,接受四面八方的信息,然后在教室和宿舍里严肃认真地讨论诸如“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辩论会、演讲赛、出刊物、办墙报,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我们最珍惜的是时间,最渴望的是学习。图书馆任何时候都是满的。校园的小径上、绿荫下,到

处是默读外语的男男女女。面对我们这些学生,老教师感到了压力,年轻老师则更紧张,有一位老师上讲台好几分钟,两腿还在发抖。我常常溜到中文系去蹭课。那位教俄罗斯文学的老师,名字叫智量,听起来就像是位深山大庙里的高僧,他乃一清瘦中年男子,不合时宜地穿着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背微驼着,一副三十年代落魄文人的模样,惟有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闪烁着对生活的热情与渴望。他是个激情四溢的人,第一堂课一开讲,手舞足蹈地把讲台上的茶水打翻了,弄湿了一身,他机智地把狼狈化作了幽默:“这就是一个细节,女仆娜塔莎把贵族老爷面前的咖啡打翻了,且看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大文豪们是怎么描写的……”从屠格涅夫一直到托尔斯泰,他侃侃而谈整整半天,趣味横生,妙语迭出。下面的77级学生可是人才济济,有的后来成了上海乃至全国颇有名气的作家。下课铃响了,鸦雀无声,继而掌声如雷,大家被彻底征服了。

除了上课,再就是春蚕吃桑叶般地读书。图书馆借出的书,远远不能满足阅读的饥渴,于是,就“克扣”下

微薄的生活费去买书。为了一部《红楼梦》,我们可以披着棉大衣,在书店门口候上半夜;买一本小仲马的《茶花女》,我吃了一周的白菜、馒头。

校园里有河,名曰丽娃河,河上有夏雨岛。曲径通幽,草木森森,花开鲜妍。沪上高校曾有流行语:“吃在同济,玩在复旦、住在交大、爱在华东师大。”可能因是师范院校,女生的基数大了点,诗情画意的“丽娃河”也助力不小,有一份杂志曾将她与外滩、浦东滨江、康平路、复兴公园等一起,并列为上海恋爱的十大地标。我们可没“艳福”,人人都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毕竟青春已大,也曾在若干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在岛上独自花前月下,浮想联翩,动过投石问路的念想。终究没有轻举妄动,实在是害怕一纸便笺从几百里外飘然而至——我妈妈说我年龄尚小,要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上……

开学是秋天,可校园里亦洋溢着一派春天的气息。交谊舞会在地下人防工事里小心翼翼地举行,当然是外语系的同学打头。那位勇敢的男同学,众目睽睽下,头一昂,额前的长发微微甩起,骑士一样,大方地把手伸给头都不敢抬的女同学;草坪的一角,几位应届生考来的男女同学正围着一位阿姨模样的同窗,全神贯注听她讲复映的印度电影《流浪者》里拉兹恩爱情仇的故事。

开学的那段时光,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让人怦然心动。四十几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那年,我奔赴安徽大学

汪贵贵

冷门专业——哲学。

上车前,姑姑和姑父一边为我高兴,一边也不无担忧地问:“哲学毕业出来能干什么呀?”我至今记得自己当时自信地回答:“我以后是要当记者的!”

从东至县汽车站到合肥汽车站,行程250多公里。那不仅是一段地理距离,更是一个农村孩子走向大学、走向更广阔世界必须努力走完的路。

至今记得第一次从合肥站前路的汽车站坐149路公交车去安徽大学新区的场景。全程一共34站,1个半小时,2块钱的空调车根本挤不上去,妈妈带着我好不容易背着行李上了一辆非空调车,已经没有座位。身体不适的她只能坐在台阶上,眉毛微蹙、脸颊通红、汗流浹背,但脸上依然洋溢着满满的开心。那辆车上全是去安大报到的学生和家,满载着快乐与希望。

大学可真是不一样啊!

校园那么大,从北操场走到南操场得20分钟,体育课可以自由选择,我学了篮球、跆拳道,甚至还有街舞,从来没因为零基础、手脚不协调而害羞,高高兴兴地尝试就是啦。图书馆高达8层,100多万册的藏书,大学前三年,我读了大几

十本国内外名著,加上哲学系的系统学习,为之后的思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大的老师“百花齐放”,有内敛的学院派,也有开朗的实践派,《易经》等热门课程一座难求,校园里流传着各种名师佚事;天南海北的同学,各有所长,大三时已经有同班同学能站在讲台上给我们深度解析康德的“二律背反”了!

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记者梦想。在专业课程学习之余,我申请成为系里的宣传干事,每天背着相机和采访本穿梭于教室、操场之间。大二时进入学校新闻中心,大三开始负责哲学系整体的宣传工作以及学校新闻中心的院系新闻部。新闻系的朋友对我说:“你比我们学新闻的还热爱新闻!”我内心无比欣喜,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带着厚厚的作品集,我在大三暑假获得了安徽商报的实习机会。因为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发自内心的热爱,大学毕业后我成功考入报社,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

2014年,时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卸任,我得知消息后主动联系采访,写下了他在安大任期的最后一篇专访《宽哥卸任,难说再见》。第一次以专业记者的身份与书记对话,听他聊了安大的激情岁

月、师生情谊、学校发展,也谈到“爱在安大”这个合肥大学生们经常提及的话题。采访结束时,我和老书记开心合影。那一刻,我特别为自己是安大人而骄傲!

“至诚至坚,博学笃行”,是安大的校训。回顾我的成长经历和职业生涯,每一步都深深烙印着安大的痕迹。后来,因大环境变化,我离开媒体行业,入职企业成为一名品牌人。但大学期间锻炼出的文字功底、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敢于尝试的态度、真诚踏实的为人做事方式、兼容并包的精神,始终陪伴着我。

距离我入学已经整整18年。这些年来,上大学变得更加容易,对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求学门槛降低,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更大,这本是好事。然而,社会大环境快速变化,大学生考研就业难度上升,赚快钱的方式越来越多,让“读书无用论”再度甚嚣尘上。

每次听到这种言论,我都忍不住要反驳。从现实层面来说,读书多少不决定人的上限,但影响着你和谁在一起、从哪个港口出发、看到哪些风景,更能兜住人生的下限;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说,大学的意义不仅是传授具体技能,更在于塑造人的价值观、做事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决定一个人对自我、他人、社会、生活的态度,最终影响其生命质量。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我们在求学道路上反复践行这个过程,漫长的人生便有了更厚重的压舱石,也有了更多璀璨的光芒。